

希望回忆录

第一卷

复 兴

1958—1962

戴高乐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希望回忆录

第一卷

复 兴

1958—1962

戴 高 乐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Charles de Gaulle
MÉMOIRES D'ESPOIR

*

LE RENOUVEAU

1958—1962

根据巴黎普隆出版社 1970 年版译出

希 望 回 忆 录

第 一 卷

复 兴

1958—1962

戴 高 乐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 5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0.125 字数 196,000

1973 年 7 月第 1 版 197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4,000

统一书号: 11171·49 定价: 0.81 元

内 部 发 行

译者说明

本书作者戴高乐(1890—1970),是法国垄断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是法国海外抵抗运动的领导者。1944—1946年,任法国临时政府首脑。1946年1月下野。1947年4月组织法兰西人民联盟,任主席,该组织于1953年解散。1958年6月重新组阁,同年12月当选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任期七年。1965年12月再次当选。1969年4月因公民投票失败而自动离职。

戴高乐离职以后,开始撰写他的《战争回忆录》续篇,即《希望回忆录》。这本回忆录记载了作者自1958年执政以来的政治活动和对国内外重大问题的基本观点,原计划写三卷:第一卷《复兴1958—1962》,第二卷《努力1962—1965》,第三卷《目标1966—1969》。但是,戴高乐在写完第二卷的头两章后就去世了,写书的计划没有完成。这里译出的是《希望回忆录》的第一卷《复兴》,巴黎普隆出版社于1970年10月出版。这一卷的主要内容是叙述戴高乐在1958—1962年执政期间的内政外交政策和活动,包括戴高乐如何重新上台和当选总统,怎样解决法国的内政问题,特别是经济问题,怎样“克服压在心头的苦痛”,实行法国海外属地的所谓“非殖民化”,并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以及法国为什么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等。书中还记述了戴高乐同苏、美、英等国首脑会谈的情况,反映了他对世界形势和苏美两霸的基本看法。

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有杭州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及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法文组的部分同志。全书注释都是译者加的。

1973年6月

目 录

第一章 ^① 政治制度·····	1
第二章 海外领地·····	37
第三章 阿尔及利亚·····	86
第四章 经济·····	137
第五章 欧洲·····	170
第六章 世界·····	209
第七章 国家元首·····	281

① 章次系译者所加。每章的标题是原书所有。——译者

第一章 政治制度

法兰西经历了无数的岁月，至今仍然生存。尽管多少世纪以来时代在召唤它，但它依然保持自己的风貌。法国的疆界可以有所改变，可是作为法国永久标志的地势、气候、河流、海洋却永远不变。那里居住生息的各族人民，在历史的过程中备受各种各样的考验。由于事物自然的趋势，加上政治的因势利导，经过不断的揉合，法兰西终于成为一个单一的民族的国家。这个民族经历了无数的世代，将来还要一代一代繁衍下去。但是，由于这个国家独特的地理环境，由于组成这个民族的各种族的天赋才能，由于它在四周邻国中所处的地位，法国具有一种不朽的特性。为了保持这种特性，每一代的法国人都负有承上启下的任务。除非是这个民族溃散了，否则在这片领土上，在这个世界中心，它必定保持其不可分割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因此，作为对法兰西负责的政府，就要承担责任，既要继承这个民族昨天的遗产，保护今天的利益，又要给它带来明天的希望。

这个有关存亡的责任，在国家发生危机的情况下，必将或迟或早向社会集体提出来！对一个政权来说，它的合法性来自它所激发的民族感情，而当祖国存亡之际，合法的政权就体现为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继存。在法国，过去墨洛温王朝、加洛林王朝、加贝王朝、波拿巴王朝以

及第三共和国，全是由于战争而获得或失去其最高权力。对我来说，是正当国家灾难深重的时刻，在历史过程中，我被赋予最高权力的。我的权力首先为不愿放弃战斗的法国人所承认，继后随着事态的发展而为全体人民所承认，最后经过了许多阻难和波折才为世界各国所承认。就是依靠这一最高权力，我才能引导人民完成拯救法国的事业。事实是，我们的国家已从深渊里挣脱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胜利的国家重新出现了。它拥有自己的领土和自己的帝国；它同俄、美、英三国一起接受了德国的投降；还和它们一起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作为战争赔偿，法国得以管理萨尔地区的经济和取得鲁尔地区应偿还的煤炭；它同其他四“大国”并列为联合国组织的创始国，而且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享有否决权的理事国。

虽然法国在被奴役时期经受了各种屈辱和压制之后，人们以为我们的人民摆脱不了政治、社会、殖民地的种种动乱，甚至最后会导致极权的共产主义来临。可是人们不久就看到：尽管发生了一些局部事件和骚动，戴高乐还是到处受到欢迎；除了正规军以外法国没有存留别的武装部队；司法部门在正常地执行职务；公共事业有胜任的公务人员负责管理；深入的改革摘掉了革命的幼芽；我们的海外领地满怀信心和耐心期待着已宣布的并已开始的解放；新政权建立起来的秩序、进步、自由到处可见。

战后，我们的经济看来会长期地——有人认为会永远地——陷于瘫痪，这是因为我们曾经在人力物力上受到严重的损失：我们的铁路、港口、桥梁、交通运输工具和无数的建筑物遭到破坏；由于德国人对我们的资源、设

备和财产进行大量的征用以致我国财政破产；由于数以百万计的法国人、俘虏、流放者和难民长期流离失所，由于在人力和物力方面受到如此惨重的损失，我们不得不进行沉重的恢复工作。尽管如此，现在国家已在逐步恢复中。在断垣残壁之中经济活动重新展开。居民的最低要求总算勉强得到满足。离开祖国的人回到了他们的家园，他们虽然历尽艰难，但并没有引起混乱。国家收入的增加，为提供全国互助金严格征收的捐税，以及1945年政府发行公债的巨大成功，使我们能接近预算平衡，并使我们能重新开放信贷。总之，胜利后只经过几个月，国家就站起来了，统一实现了，希望复苏了，法兰西又占有它在欧洲和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我得到了社会舆论的大力支持。相反，那些很快又重新出头露面的、与选举、经济、工会有关的组织，却迟迟不肯对我表示赞助。大敌刚去，它们就用各种语调，借一切题目对我大肆指责，但只要是国家危在旦夕，它们不会造成障碍，使我不能履行我应尽的职责。可是，祖国命运一经有了保证后，所有过去的种种企图、野心和威胁的手法又在我们的人民面前出现，好象我们人民不久前因之而遭受的那些骇人听闻的灾难一下子就被置诸脑后了。

许多政党重新出现了，不妨这样说，它们的名称、幻想和运动官职的人，还是同以前一模一样。这些政党，虽然为迎合舆论要求表面上对我个人表示尊重，但对我的政策却恣意抨击。它们虽然没有否认我在国家极其严重的情况下——那时他们大多都不在场——对祖国所作出

的贡献，但是却在大叫大嚷，要求恢复它们认为是正常的状态，也就是说，恢复原有的政党政治制度，要求由它们来掌握政权。我应该承认，在社会舆论方面，也没有出现任何与此相反的意见。根据各界人士、各个论坛、代表各集团的发言、各报的专栏所讲的或所写的一些东西看来，都表现出除了那些仅能使国家分裂和互相倾轧的党派以外，仿佛没有任何事物、任何一个人是可以真正代表国家的。

当然，我相信此后主权应该属于人民，如果人民的意志可以通过全体直接来表达的话；我不允许把主权让给那些代表不同利益的政党去瓜分。在我看来，这些政党应当有助于人民发表意见，从而有助于选出议员，让他们得以在议会中讨论并表决各项法案。但是，为了使得国家理所当然地成为法兰西统一、全国最高利益、全国人民持续进行政治活动的工具，我认为必要的条件是，政府绝不可从议会产生出来，换句话说，不是从各政党产生出来，而应由全国人民直接委任的一个超党派的元首遴选出来，而这位元首具有计划、决定和行动的权能。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由于我们的个人主义、我们的分歧和过去的幸给我们遗留下来的分裂因素，我国所有那些无组织的倾向，就会再一次使国家陷入这样一种处境：各种变化无常的思想意识的对抗，部门间的竞争，政府对内对外的措施似乎既不能持久又毫无价值。既然事实证明我国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只能依靠这样一种权威——它有能力克服一切分歧，并且考虑那些摆在它面前的有关现在与将来的问题，因而我认为此后我要进行的重大的斗争，

目的在于赋予法兰西一个能够肩负它的命运的共和国。

然而,我不能不承认,一旦危急时期过去,不经历一些新的艰苦的尝试,改革是不可能实现的。确实如此,因为在德军占领和维希政权压制下,法国人的自由权利曾被长期剥夺。那种过去所谓民主的政治把戏正在恢复已失去的光彩。甚至我许多从前的战友,不久前作为抵抗运动时的领袖,还在咒骂政党,现在这些人竟竭力要取得政党的领导地位。还有,为了重整旗鼓,所有的选举组织都发誓要谴责过去的流弊,今后要严防再犯。在我国的敌人及其同谋者实行独裁之后,我根本没有意思建立我的独裁制。由于我希望通过普选来克服当时已迫在眉睫的共产主义的强大威胁,由于我号召人民选出国民议会,那么,我当然要事先考虑到:这一个国民议会难免落入政党的手里;在国民议会和我之间会立即发生势不两立的情况;关于制定新宪法来代替已经死亡了的第三共和国的宪法这个问题,我们之间的意见也会是完全不一致的;因此,可能接替我的那个政权,即使从选票的数字来看将是合法的,但毕竟是会缺乏全国拥护的合法性。

当炮火停息以后,我就决定了我的态度。除非我把当选的议员排斥掉,除非我象前人那样以暴君的面貌出现,除非我采取一种自我毁灭的立场,而这种立场很快因遭到法国和西方在精神上的普遍反对无法再坚持下去,否则我只好迟早让政党掌权的制度再度恶劣地表演一番,不过我下了决心绝不替这种制度作掩护或当傀儡。正因为这样,我就洁身自好,自动辞职了。等到时机来临,我会重新出来拯救国家——或者由我本人亲自出马,

或者由别人按照我留下的范例去行事。虽然如此，但考虑到将来，我在议会尚未选出以前，先建立了公民投票表决制，让人民来决定国事。今后要使宪法生效，必须直接取得人民的同意，这样，就创造出一种民主方式。有朝一日通过这种方式，我将亲手制定一部好宪法来代替由政党策划的并为政党服务的坏宪法。

他们这种制度在过去十二年内一再作出了各种表演。在国民议会和参议院内部，议员们的各种不断翻来复去的政治组合、阴谋诡计和脱党变节的纠纷不断地发生，加之，政党的大会和委员会的种种建议，又受到报纸宣传、党派会谈、团体组织压力的影响，结果相继进出马提翁大厦的有十七位总理，轮流组成过二十四届内阁。这十七位总理是：费利克斯·古安、乔治·皮杜尔、莱昂·勃鲁姆、保罗·拉马迪埃、罗贝尔·舒曼、安德烈·马里、亨利·克耶、勒内·普利文、埃德加·富尔、安托万·比内、勒内·梅耶、约瑟夫·拉尼埃、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居伊·摩勒、莫里斯·布尔热-莫努里、费利克斯·盖伊阿、皮埃尔·弗林姆兰。这些有能力的人无疑都有资格执政——在十七人中有六位以前曾在我的内阁里担任过部长，还有其他四位后来也在我领导下任部长。但是由于这种议会制度的荒谬性，他们便先后被剥夺了应付事变的真正领导权。多少次，我远远地看到他们无法可想地进行挣扎，看到他们这样浪费精力，我感到多么伤心！不管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力图做些什么事，国内外的人都看见这种可耻的情景：即各届“政府”全是依靠妥协而组成的，刚一成立就四面受敌，有时由于内部倾轧和

意见分歧随即发生动摇，以致成立不久就被一次投票所推翻，而这种投票往往只能表达那些迫不及待想当部长的人们的欲望，结果竟使内阁虚悬的时间长达几个星期之久。还有，在演出这类喜剧时，可以看到各式各样自许为总理的人——有的尚在“协商中”，有的已被“打听”出来了，有的已被“任命”了——在一位总理真正得到委任之前，都登台表演幕间插曲。在爱丽舍宫，先后出任总统的樊尚·奥里约和勒内·戈蒂，尽管他们关心公众利益和国家荣誉，也只能无可奈何地主持这出荒唐可笑的芭蕾舞的演出。

然而，时势总是按照自然进程发展的，生活又不能不受时势的影响。同样，国家除了受到来自政权机构的影响外，时常还要受到其他方面的影响。就内政方面来说，行政管理、技术人员、军事人员，对他们职权范围内的一些紧急的事，经常按照他们自己的主张去处理。至于对外问题，尽管表面上有外交代表，有时还加上内阁的无能，说到底仍然是由外国人作出决定，并得到他们所希望的东西。

的确，在经济领域里，经过长期物资匮乏以后，消费要求增加了；由于国家大量建设的需要，势必引起经济的活跃。在我辞去政府职务前创设的那个计划委员会正在努力领导工作。工农业生产在不断增长。但是大量进口没有出口来平衡，增加工资却没有相应地提高生产率。政府由于不能妥善地安排一切，不得不付出逆差的代价。马歇尔计划的贷款以及不断地向华盛顿要求的借款，动用法兰西银行在战时藏在马提尼克岛、法属苏丹和美国的黄金储备——我曾把它保存得完整无缺，特别是预算中

的赤字，换句话说，就是通货膨胀，用这些办法来弥补收支的不平衡。不过因此却产生了这样的后果：法郎不停地贬值，贸易停滞，借款用尽，一句话，国家面临货币财政破产和经济崩溃日益增长的威胁。毫无疑问，有时幸亏有象安托万·比内和埃德加·富尔这一些部长及时的努力，情况才得到缓和。但他们一走，混乱状态就又出现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在解放时期曾经实现的措施之外，我的政府在社会问题方面没有取得任何新的成就。为了应付一连串的罢工事件，人们只限于在各种各样的酬劳外再增加若干成的工薪，实际上是靠增发钞票和公债来解决的，但物价上涨又逐步抵销了增加的收入。的确，我不久前实行的社会保险、家庭补贴、农业租借新规定等措施，是足以解救穷困、疾病、失业及年老无靠的种种困苦，使社会骚乱不致因此而产生。但是，关于那些需要长期努力才能解决的问题，比如住宅、学校、医院、交通等问题，却积压起来，推迟解决，以致严重影响未来。

就国内情况来说，由于我国有其天然的适应性，能稍为减轻政权的不稳定直接造成的一些后果；但就国外情况来说，那就不是这样的了。我过去凭着不懈的努力为法兰西的独立、地位以及利益所取得的一切，很快就受到了损害。过去使我们得以站立起来的那种动力，现在已经消失了。政府一心一意只在满足别人的要求。当然，它为了替自己的让步作掩饰，有意制造一些空论：一是用统一欧洲的名义来放弃过去胜利业已使我们获得的利益；一是借口达到大西洋的团结，使法兰西屈服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霸权之下。

因此，尽管没有得到可靠的保证，却同意在西方国家的三个占领区内成立一个德意志的中央政权。“欧洲煤钢联营”也成立起来了。它对我们恢复被破坏的矿业并没有提供什么手段，却反而免除了德国人对我们必须供应的燃料，而且还使意大利人取得建立大规模钢铁工业所需的设备。因此，放弃了法国在萨尔区的经济扣押权以及在这个地区业已建立的自治政府。此外还签订了创设一个“欧洲防务集团”的协议——如果不是因为法国全国人民奋起反对并在最后一刻起了驱邪祛魔作用的话，这项协议就将付诸实施。这个组织目的在于剥夺作为战胜国的法国拥有军队的权利，在于使我们应有的军事力量和战败的德、意两国的混在一起（英国为了自己打算也拒绝这种让步），最后还把这一不属于任何国籍的军事集团的指挥权全部交给美利坚合众国。因此，所谓“大西洋联盟”的原则声明一旦得到华盛顿方面同意，即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建立起来，而根据这个组织的规定，我们的国防以及我们的外交政策就会消失在一个由外国人指挥的体系中，同时驻在凡尔赛附近的美国总司令就要代表新世界来对旧世界执行军事权力。因此，在苏伊士运河事件发生时，伦敦和巴黎派去反对纳赛尔的远征军竟被这样安排：法国军队不论是哪一种兵种、哪一种等级，一律都受英国人指挥。当英国人在美、苏的警告下召回他们的部队时，我们的部队才得以撤回。

在法国和海外领地之间的关系发展上，我们的政府特别显得举棋不定；加以声势浩大的独立运动同时唤起了所有殖民地人民的独立要求，更使我国政府无所适从。

由于英国和法国的相对衰弱；由于意大利遭到挫败；由于荷兰和比利时屈从美国的旨意；由于亚洲人和非洲人受到在他们土地上所进行的战争的影响，而殖民者又需要他们的协助；由于自由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都大肆鼓吹他们的主张，一致要求种族和人类的解放；最后又由于现代经济状况在这些受到剥夺的群众心中唤起的种种要求——由于以上的一切，全世界呈现出扰攘不安的情况，这种情况同过去欧洲列强的海外大发现和进行征服殖民地时所出现的那种景象相比，方向上固然是相反的，意义上却是同样深刻的。显然，帝国建立的基础——对远方殖民地的统治，已经完结了。但是，有没有可能把旧日的从属关系变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有特别联系的合作呢？

1944年1月，我在布拉柴维尔会议上以法国的名义提出了关于这个重大问题的必要方针，随后又在1945年遵循着同样的方针继续给予阿尔及利亚、黑非洲和马达加斯加的全体人民以选举权利；我在巴黎隆重地接待了突尼斯的贝伊和摩洛哥的国王，把他们作为享有全权的君主来看待。我派阿尔让利厄和勒克莱尔率领大军前去印度支那，指示他们只能驻扎在越南南方，除非我有命令，他们不得把部队开往已由胡志明管辖的北方，我还派出以桑特尼为首的代表团与胡志明接触，以准备进行谈判。当时我虽然绝不幻想一夜之间毫无阻碍和困难就能以一个自由协商的联合组织代替我们的帝国，但我认为这个伟大创举是能够实现的。然而这样的事业需要在一个坚强的政府坚持不懈的领导下才能进行。这个政府在有关各族人民看来是真正代表宽宏大量、坚强有力的法

国的，象在解放时期似乎曾给他们展示出来的法国一样。

不言而喻，政党制度是不能适应这样的形势的。各种对立的倾向互相并存，各自只知一味空谈，却没有实际行动，这种制度怎么能对非殖民化的要求作出明确果断的抉择呢？又怎么能够克服并在必要时铲除象这样一种伟大事业势必会引起的一切情绪上、习惯上和利益上的对立呢？当然，在各政党的连续不断而又前后不一的态度之间，也有某些重要代表提出过一些具有启发性的倡议，但是这些倡议由于权力的冲突终于也未能贯彻执行。

关于印度支那问题，在我离职后，政府的第一个意向是邀请胡志明到巴黎来进行谈判，胡志明也表示同意。但后来使用武力的趋势占了上风。这样一来，便使我们卷入一场黑暗而渺茫的斗争之中，为时达八年之久；在这期间，政府时而想要战胜，时而想要议和，这两种意愿交替变化，犹豫不决。尽管战士们勇敢善战、不惜牺牲，行政官员们努力工作、卓有成绩，但最后结果还是军事上遭到严重挫折，继之而来的是不可避免的屈辱性的政治解决。

对于摩洛哥和突尼斯这两个保护国，过去政府一会儿倾向于采取高压政策，甚至逮捕并流放摩洛哥的穆罕默德五世，把突尼斯的布尔吉巴也软禁在寓所内；一会儿又试图进行和解，同意摩洛哥国王复位，给与突尼斯摄政国以内政自治权，甚至承认这两个国家的正式独立。但是，由于没有决心完成这种变革，因此法国还在当地保留一部分权力和军事力量。但这种权力却天天受到攻击，军事力量只是横受凌辱。